

香港

香港抗日游擊隊

抗日游擊隊



香港文化
的珍貴一頁

香港抗日游擊隊

陳達明 著

香港抗日游擊隊

出版日期：2000 年 10 月

定價：港幣 118 元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作者：陳達明

編輯：彭智明

出版：環球(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譚信良

印刷：奧曼製作有限公司

電話：(852) 2397 2336

ISBN 962-650-238-x

序 言

這本書，是紀錄日本法西斯佔領香港的黑暗年代，游擊隊抗擊日本統治，堅持了3年8個月的真實事跡。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重要海軍基地珍珠港，美、英於8日對日正式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8日清晨，日軍第45轟炸機隊轟炸啓德機場和各戰略要地，艦隊封鎖維多利亞港，迅速取得對香港的制空、制海權。與此同時，日軍第38師團三個步兵聯隊攻入新界，突破英軍“垃圾灣防線”進入到九龍市區；駐港英軍司令馬爾比(C.M. Maltby)下令退守港島。18日開始，日軍強攻北角，佔領了跑馬地、淺水灣；激戰至25日，英軍終因兵力薄弱，外援斷絕，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及駐港英軍9000人被俘，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在香港實行野蠻的法西斯殖民統治。

12月9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日軍大舉進攻香港的同時，為配合美、英盟軍作戰，開闢敵佔區游擊戰爭，由寶安地區派出精幹武裝分隊插入元朗、大埔，並緊隨日軍攻佔九龍，

深入荃灣外圍荃錦公路口及青山道、九華徑一帶，打通從九龍市區到寶安游擊區的交通綫。惠陽地區亦派出精幹武裝分隊和海上護航分隊，經大鵬灣進入西貢半島的塔門、赤徑，並伸展到獅子山、牛池灣一帶，打通從九龍啓德機場經西貢墟、企領下到惠陽游擊區的海上交通綫。游擊隊建立兩條交通綫，保護了被日本“遞解部”強制驅趕出境的幾十萬市民在旅途上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護了大批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回國的安全；保護了大批滯港戰略物資運輸往西南大後方的安全。

游擊隊在港英政權崩潰，日軍政權尚未建立的真空時期，為新界居民肅清土匪，維持治安；發動青年組成民兵常備隊、自衛隊，拿起英軍在戰場丟棄的機關槍、步槍、手榴彈，經游擊隊培訓，保衛自己家鄉，填補了政權過渡空間，並成為港九人民抗日游擊隊建軍的基礎。

1942年2月3日，港九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新界西貢半島的黃毛應村宣佈成立，任命大隊長蔡國樑，政治委員陳達明，政治處主任黃高陽，負責統一指揮由寶安，惠陽進入港九新界地區的長槍連隊、短槍武工隊，海上武裝隊，城區地下武工隊和情報系統，以及新組成的各地區民兵常備隊、自衛隊，開展敵佔城市和近郊游擊戰爭，配合反法西斯同盟軍作戰。

香港是日軍在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戰略中轉補給站，日本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港督，野間賢之助大佐為憲兵部部長，率領由步第67、68、69、三個大隊組成，約3000人的警備隊和憲兵隊駐守；在港九新界各地區設警備派遣隊和憲兵隊，並招募數十名警察和憲兵巡查隊；在鐵路、公路要點修築碉堡，重要交通路口設檢查崗哨；在新界、大嶼山各海港以及大鵬灣海域派出炮艇日夜巡邏；整個港九新界地區軍警林立，嚴密控制。再加上港九新界地區地域狹窄，海港阻隔，山小林稀，大嶼山更是一個孤島，游擊隊在這樣的城市和近郊開展游擊戰爭，採取什麼戰術作戰，在游擊戰爭歷史上少有這種範例；會不會付出重大生命代價，游擊隊到底能否生存和發展？需要這一支新組建的游擊隊勇敢地迎接挑戰，自強不息，在實踐中探索。

港九大隊游擊戰士經歷無數艱險，不怕犧牲，堅持敵佔區反法西斯戰鬥，直至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同年8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慤 (Cecil Harcourt) 率軍艦抵港，游擊隊奉命於9月28日發出宣言，向港九新界同胞告別，一周內撤出港九地區。

1946年4月30日，港督楊慕琦從瀋陽戰俘營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1947年7月25日，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接任為第二十二屆港督，往後直至於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topher Patten) 離任，前後經歷半

個多世紀。歷任港督對於反法西斯戰爭時期，曾經配合盟軍英勇作戰，深入集中營裡營救英軍戰俘，長期支援英軍服務團進入香港建立情報系統的游擊隊，一直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不給予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這是不公正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是1998年12月28日，在大會堂隆重舉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將115名烈士名冊安放在烈士紀念龕內。特區政府確認了港九人民游擊隊的歷史地位。

我作為一名老游擊戰士，又是當年港九大隊領導成員之一，作為歷史見證人，有責任將香港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光榮歷史，如實地作出交待。正如新界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銘記的：英雄烈士們的光輝業績同港九新界的山山水水一樣，萬古長存！

陳達明

2000年8月

目錄

序言	i
民族的苦難	1
全面抗戰	13
香港抗日游擊隊的誕生	21
護送抗日文化人脫險	31
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	43
開展城市近郊的游擊戰爭	57
海上游擊隊	85
大嶼山的游擊戰爭	107
活躍在城市的游擊隊	131
游擊隊的後方勤務	145
再會吧，香港	159
後記	169
附錄	171

一 民族的苦難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點鐘，日本關東軍炮轟中國東北的瀋陽城，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三省的戰爭。

瀋陽城守軍毫無抵抗，一夜之間全部就被日軍佔領了。日軍勢如破竹，又迅速攻佔了安東、本溪、營口、長春等地；到21日，日軍已佔領了整個吉林省，接著攻佔了黑龍江省；翌年1月，又佔領了錦州。總共不到4個月的時間，130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土地，3000萬人民，在不抵抗主義的壓抑之下，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淪為亡國奴了！

流亡到關內北平城的東北學生，悲痛地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無限的寶藏，那裡有我親愛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他們唱出了民族的苦難，唱出了救亡的吶喊。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南京中央政府於9月23日頒發了《告全國軍民書》，說：“現在政府既以此案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裁決，故希望中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須維持嚴肅冷靜之態度”。但是，整個東北三省淪亡，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了極大的壓抑！全國各地包括上海、青島、重慶、長沙、廣州以至香港的人民，無不義憤填膺，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

全國各地學生的抗日情緒首先沸騰起來，他們發起抵制日貨、街頭演講、組織遊行示威向政府請願。9月28日，北平和

2 • 香港抗日游擊隊

上海學生2000多人冒雨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他們在中央黨部門口等候了半天都沒人理睬，大門緊閉；憤怒的學生轉向外交部，沖開了警衛的阻攔，毆打了外交部長王正廷。學生們在仇恨日本侵略者的同時，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極為憤懣！到了11月，天津學生宣佈總罷課，派代表南下請願，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通電響應，情緒激昂；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不得不出面向學生們解釋為什麼不抵抗。

學生們壓抑已久的民族感情，像火山一樣再次噴發出憤怒的岩漿。12月9日，上海學生數萬人包圍了上海市政府，抗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公安局逮捕請願的北大學生代表。他們在市政府門前堅持了一夜，終於迫使市政府釋放了學生代表並交出綁架學生的兇手。學生們取得了勝利，當場組織民眾法庭公審兇手，並向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陶百川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陳希曾發出傳票。

由於國民黨和中央政府一直不肯答應學生們的抗日要求，全國各地愈來愈多的學生便擁到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南京請願。12月15日，學生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請願，結果有5個人被捕。12月17日，學生又聚集合了3萬人，聲勢浩大，再次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這一次，軍警開槍鎮壓了，在珍珠橋附近，打死學生30餘人，打傷100多人，愛國青年學生的熱血染紅了珍珠橋下的流水，青年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受到了血的洗禮！

日本侵略者的胃口愈來愈大

日軍輕而易舉地佔領東北之後，侵略的胃口愈來愈旺盛，繼續策劃新的進攻。當時，全國學生和人民請纓殺敵的抗日情緒異常高漲，可是中央政府依然堅持著不抵抗主義。

1931年11月，日本軍向錦州進攻，中央政府外長顧維鈞向國聯提議劃錦州為中立區，希望日軍不要繼續進逼，而以中國駐軍退入山海關作為條件。11月27日，外長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公佈劃錦州為“緩沖區”。這個向日本人屈服妥協的不抵抗消息傷害了全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遭到了全國各地的強烈抗議。政府不得不又申請國聯取消原來的提議。但是，中央政府仍然不支持東北軍隊抗戰，錦州駐軍孤立無援。他們埋怨：“豈欲士兵徒手作戰耶？此次最可痛心者，為受傷士兵均無醫藥，聽其呻吟”。1932年1月2日，日軍不費什麼力氣又佔領了錦州，侵佔東三省的計劃全部實現。

在不抵抗主義的鼓勵下，日本進一步部署了進攻中國中心基地上海的新計劃。1932年1月18日，日本5個和尚在上海馬玉山路向工人義勇軍成員挑釁，發生衝突；24日日本人又自焚公使重光葵公館，誣蔑是中國人所為。藉著這些事端，於1月28日，日軍進攻北站、江灣、吳淞等地，上海戰爭爆發了。

中央政府原來打算在戰爭爆發前，派憲兵第6兵團去接替抗日情緒激昂的19路軍防務；但由於日軍的進攻提早，19路軍就地英勇抗擊日軍。激戰了7天，日軍遇到了中國軍隊的真正抵抗，連連遭受失敗。

4 • 香港抗日游擊隊

19路軍的英勇戰鬥激發了上海市人民的抗日熱情。在日本工廠做工的7萬中國工人，以及在日本商店、機關工作的職員舉行罷工，全上海市民踴躍捐獻，全國各界人民揚眉吐氣，都以極大的熱情支持前線抗日將士。



19路軍英勇抗戰。

到了2月7日，19路軍愈戰愈勇。日軍潰退，日軍指揮官被撤職；又敗之後，指揮官換了植田；再敗之後，第三次換指揮官為白川。日軍又陸續增兵至10萬人。

上海抗戰一個月來，抗日將士和人民群眾舒發了中華民族敵愾同仇，艱苦奮鬥的精神，湧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可是中央政府仍然要同日本“維持雙方友誼”，調派第5路軍去上海制止19路軍的抗日行動。沒有想到第5路軍激於民族義憤，

反而同19路軍一起並肩作戰。大大出乎總司令蔣介石意料之外。

中央政府派宋子文對外發表談話，轉述蔣介石的決定：“各軍將士未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動作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在上海自發英勇抗戰軍隊孤立無援，而日軍則有恃無恐，繼續增兵，在瀏河登陸偷襲。3月1日，19路軍被迫撤退，日本佔領了淞滬一帶。5月5日中央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停戰協定，派郭泰祺為交涉代表，承認日軍永久停駐吳淞、閘北、江灣等中國土地，承認南市、浦東不駐守中國的任何軍隊，承認長江沿岸福山到太倉、安亭及白鶴江起直到蘇州河為止的地區，實行由英法美意等國組織“特別警察”共管，承認把19路軍調離上海，到福建省去“剿共”等等。中央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抗日救亡運動曲折發展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於1932年組織了“滿洲國”，捧出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執政”。1934年3月改稱“滿洲帝國”，溥儀改為皇帝。全東北實行保甲制、徵兵制，壟斷金融、發行紙幣，加強榨取東北三省人民的財富，作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

1933年1月3日，日軍進攻山海關，2月21日，又分三路進攻熱河；3月4日，日軍僅以180人的兵力，侵佔了承德，一共花了10天時間，熱河全省便告淪陷，接著，日本又向長城防線的軍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進攻，企圖一鼓作氣，長驅

直入華北地區。

駐守長城防線的第29軍及其它部隊，激於愛國義憤，自動奮起抗戰，屢次獲得勝利。可是中央政府同對待19路軍一樣，不許抗日。蔣介石親自跑到河北省保定縣，給請纓殺敵的將領下令：“侈言抗日者殺勿赦”。長城一線的守軍孤軍奮戰，勉力防禦，到了5月，因敵眾我寡，無力支持，便放棄長城各口要塞；日軍乖機強渡灤河，進犯灤西，一舉侵佔北平近郊的密雲縣、遵化縣、薊縣、玉田縣、豐潤縣及唐山等22個縣、市。在察哈爾省東部，日軍佔領了沽源、寶昌、高都、張北等縣，戰火一直燒到北平、天津一帶，華北危亡！

長城內外大片國土淪喪，民族危機深重、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醞釀著新的高潮。

從東北退到熱河，察哈爾兩省的義勇軍，不聽中央政府的指揮，在淪陷區艱苦抗戰；救國軍馬占山缺少槍彈，組織了大刀隊，繼續堅持；甚至中央政府直屬軍隊的將領，也都紛紛請求抗日，反對蔣介石的妥協投降政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於1933年1月17日發表宣言，呼籲中央政府在停止進攻紅色區域等條件下，共同抗日，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參加了共產黨的原西北軍將領吉鴻昌，在察哈爾省同抗日將領馮玉祥、方振武等，組成察綏抗日同盟軍，向全國通電抗日，不聽從中央政府命令，成為推動全國抗戰的重要力量。

察綏抗日同盟軍原來只有幾千人，他們得到華北地區人民

的支持，很快擴大到10幾萬人。1933年6月22日，同盟軍分三路迎擊日、偽軍，連克康寶、寶昌、沽源等縣，偽軍紛紛反正投降，同盟軍聲威大振。7月7日，同盟軍又包圍了察哈爾省北部重鎮多倫，乘勝出擊，把日、偽軍趕出了察哈爾省境外。同盟軍的奮勇作戰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愛戴。

但是，同盟軍的抗日行動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制，以“妨害中央政令統一”、“破壞整個國策”為理由，派龐炳勳為察哈爾省“剿匪”司令，調集16個師的兵力，對張家口地區的同盟軍進行全面封鎖。中央政府軍隊總司令何應欽，又同日本關東軍代表柴山商訂了協同進攻同盟軍的作戰計劃。到了8月，日軍重新佔領多倫，同盟軍總司令馮玉祥被迫辭職下野，閑居山東泰安縣；同盟軍亦在中央軍和日軍夾擊下，苦撐到9月份，便告瓦解。

同盟軍的抗日烽火被撲滅以後，不到兩個月，中國的南方發生了要求抗日的“福建事變”。

上海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中央政府企圖把抗日情緒高漲的19路軍調到福建去同中共工農紅軍作戰。但19路軍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厭惡在國家危亡的形勢下打內戰，抗日情緒更為激烈，他們推動上層軍官走上抗日反蔣的道路。1933年11月20日，19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人，聯同國民黨內李濟深、陳銘樞等反對蔣介石政策的人，在福州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同中國共產黨民主政府簽訂了抗日停戰協定。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把19軍路擴充為5個軍，向閩浙邊界推

進，直接威脅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當然不會放過19路軍聯共抗日，並威脅中央政府的軍事行動。1933年底，由蔣介石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向福建地區進攻。為了取得日軍的諒解與支持，派親日分子陳儀到台灣同日本訂立秘密協定。日軍公然派軍艦開入馬江，協助蔣介石佔領廈門，堵塞後路，全面施加壓力。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內部還不穩固，在福建人民中的根基不深，經不起蔣介石的強大壓力，終於在1934年1月失敗了。

宋慶齡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宋慶齡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楊杏佛任總幹事。同盟的成立，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高潮中，爭取人民有抗日的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求人民有抗日集會自由，有言論、出版自由，反對中央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同盟要求釋放主張抗日的政治犯，營救左翼作家丁玲，還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廖承志、羅登賢、陳賡等。同盟的主張和行動同中央政府的不抵抗主義針鋒相對。蔣介石害怕宋慶齡的崇高威望和號召力，不顧一切地採取高壓政策，親自佈置特務頭子戴笠派特務刺殺了楊杏佛，並又殺死兇手消滅口供；宋慶齡、蔡元培也接到特務的恐嚇信。同盟的活動十分困難，不得不停止下來。

魯迅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動後，左翼作家集中到魯迅的旗幟下，繼續反對中央政府限制出版自由，要求“攻破一切反動的保守的要素”，宣傳抗日，反對妥協。



1938年宋慶齡(中)和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合影。

魯迅的戰鬥雜文《二心集》初版時，當局刪去了大部份，只剩下零散的章節，魯迅便改名《拾零集》繼續出版，以示吶喊；並諷刺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對逆流進行了無情的鞭答。

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人不滿中央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和政府的專橫、腐敗，他們趨向左傾，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張。中國